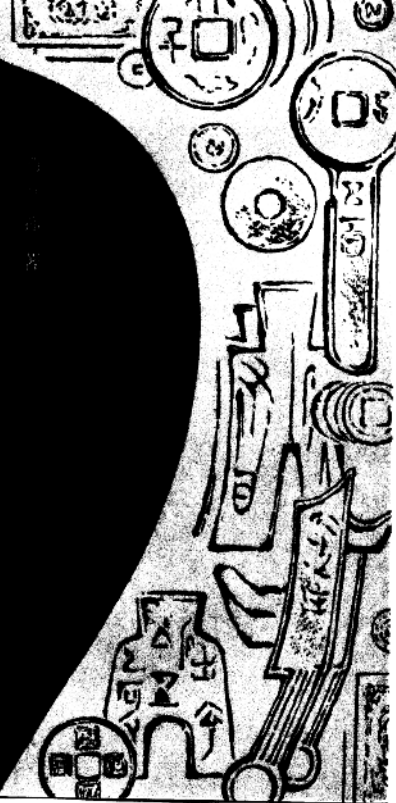


中國儲蓄史話

2.9



前 言

“储蓄”这个词，从广义上来说，是人们生活中一种积蓄财物以备需用经济行为。从狭义上来说，是指人们的货币存储。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货币储藏手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所有制下，货币储藏手段职能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储蓄事业也经历了实物储藏、货币储藏、前资本主义金融机关的储蓄，以及近代银行储蓄的长期发展过程。有关我国储蓄的起源、发展及其变迁的中国储蓄发展史，目前国内尚未有人专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为了系统地介绍中国储蓄事业的发展，作者从大量的史料中，搜明剔微，归纳成史，试图探索一下前人所未涉及的空白领域，以期增进读者对中国储蓄事业发展的关注。

本书是储蓄发展史，在论述上必须做到勤搜博采，以明渊源。但见闻所限，难于一一考证。加上作者学识疏浅，成书仓促，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难免没有错漏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订。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储蓄之事	(1)
(一) 古籍里有关储蓄之事的记载	(1)
(二) 古代的消费观	(4)
(三) 货币储藏的开始	(7)
(四) 铜币的储藏	(10)
(五) 纸币不能作为储藏手段	(13)
(六) 中国最早的储蓄机关	(16)
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银行储蓄业务的建立和发 展	(19)
(一) 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发展, 为我国储蓄银行的 建立提供了式样	(19)
(二)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谈银行和储蓄	(24)
(三) 外商银行首先在中国办理了储蓄业务	(29)
(四) 中国的第一家商业银行	(32)
(五) 中国的第一家储蓄银行	(34)
(六) 其他各类储蓄机构的兴起	(36)
三、“中华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以前的储蓄事业发 展情况	(37)
(一) 各类储蓄机构	(37)
(二) “民国”成立以后的储蓄发展过程	(51)
(三) 储蓄存款业务的变化	(54)

(四) 储蓄机构资金的运用	(56)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储蓄概貌	(60)
(一) 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性储蓄	(60)
(二) 所谓的节约建国储蓄	(62)
(三) 用美金作幌子的储蓄券	(64)
(四) 骗人的“特种有奖储蓄券”	(66)
(五) 纯捐税性质的储蓄	(67)
(六) 勒索人民的“乡镇公益储蓄”	(68)
(七) 黄金存款的丑剧	(70)
(八) 官僚资本主义银行排挤商业银行储蓄业务	(73)
(九) 群众储蓄深受通货膨胀之害	(74)
(十) 国民党政府储蓄法规面面观	(76)
(十一) 抗战胜利后群众储蓄遇到的三重苦难	(81)
五、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储蓄	(85)
(一) 毛泽民同志的一封信	(85)
(二) 解放区的农村储蓄	(87)
(三) 新解放区的城市储蓄	(91)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人民储蓄事业	(94)
(一) 人民储蓄事业发展概况	(94)
(二) 人民政府清偿解放前存款	(99)
(三) 储蓄种类的变化	(101)
(四) 储蓄利率的演进	(105)
(五) 储蓄机构的发展	(103)
(六) 保障储蓄的各项规定	(111)
附录	(115)
(一) 清代设立银行之倡议	(115)
(二) 新华储蓄银行的倡设和业务活动	(118)

(三) 新华储蓄银行储蓄章程	(120)
(四) 万国储蓄会发行有奖储蓄会单章程	(124)
(五) 万国储蓄会投资状况表	(129)
(六) 储蓄银行法令与草案	(131)
附表	(139)
1914年—1936年我国各储蓄机构储蓄存款逐年统计	(139)
1937年—1945年我国各储蓄机构存款统计	(141)
中国各种储蓄机关储蓄存款之余额及百分数	
(1932—1933年)	(142)
储蓄存款分类 (1933年按平均数)	(142)
银行储蓄存款平均数占银行存款总额平均数之百分数	
(1932—1933年)	(143)
银行储蓄存款额平均数对储蓄部资本、公积金额平均数	
之比率 (1932—1933年)	(143)
中国储蓄机关资金运用 (1932年) (1933年)	(1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储蓄存款历年利率调整情况	(145)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储蓄之事

（一）古籍里有关储蓄之事的记载

“储蓄”这个词，在我国古代是泛指储蓄的行为，既包括了国家为预防灾害积蓄粮物，也包括古代劳动人民贮粮备荒、积钱备用的意思。古书上不乏这样的记载。

指国家储备而言的，如《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强调了国家积余储备的重要性。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也都提倡国家要广增积藏，多事储蓄。如：“汉献帝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卫觊书与荀彧曰：‘……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或以白曹操，操从之。”（陈寿：《三国志·魏书》）

在封建统治比较繁荣强盛的年代，官府的积粟，甚至达到发生霉烂的程度，所以《唐书》说，开元天宝之际，“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大量的陈年积谷都霉烂了。

不过，历史上这种丰盛年景并不多见。封建帝王为了贮粮备荒，在收成较好的年份就要多积蓄一些粮食。如在金太宗时期，金太宗曾下诏贮粮，其诏曰：“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谨，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穆昆）为一廩贮之”。（《金史·太宗》）南宋高宗时，农业生产年景颇

好，他不仅广征农税，而且还册命各州府购粮储备。据《宋史·高宗七》记载：“绍兴十八年闰八月，命临安平江二府，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以广积蓄”。

以后史书上也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可见历代王朝大都是十分重视积蓄储备的。

“储蓄”用以说明民间私人积累的，首见于秦《尉繚子》：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缕之事，女无修饰纂组之作。”（《尉繚子·治本篇》）后来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章帝纪》中也写道：“古者急耕稼之业，致来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正以岁不登而人无饥色。”这些记载不仅明确肯定了储蓄财物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大力提倡勤劳尚俭的。

从古代的典籍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充腹、盖形之外，要有一些粮食、财物或者金钱的储蓄，这是人们保证一定生活水平所决定的。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久远，在封建社会初期的领地制度下，农奴行使份地，实行劳役地租，和农奴对立的封建贵族和领主，残酷地剥削农奴，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只有人身依附的地位，是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农奴除耕种一定数量的公田外，还有私田可以做自己的收入，积蓄主要是一些农产品。随着私田的逐渐增加，封建地主阶级形成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农民尽管饱受地租和赋税的剥削，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地位，生活上才开始有一点积余。地主阶级需要压榨和剥削农民，所以他们的代言人，为了便于“治人”，就要求农民要去掉雕文刻缕，绣饰纂组，

而农民为了求生，也不得不在辛勤劳动之余，努力积蓄，以求节用备荒。

古代劳动人民所以储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人民有着勤劳朴素的优良传统，储蓄就是从这种良好道德衍生出来的好风尚。

在古代的诗歌和谚语中，不但记载着劳动人民辛勤而艰苦的劳动，也抒发了他们面对自己的劳动果实而感到的内心的喜悦，和在收获季节的快乐。如《周颂·载芟》中写道：“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湿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热情地形容他们的劳动是：成千对的农民在一起耕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种，父子兄弟个个强壮。到秋收的时候，场面更加壮观，他们刷刷地割下谷物，把这些劳动果实成堆地堆起来，堆得象墙一样高，象梳蓖一般密，装满了成百的谷仓，把自己的粮食蓄积起来。诗歌是这样描述的：“获之桎桎，积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栲，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周颂·良耜》）道出了劳动的紧张，收获以后增加了蓄积的欢畅。他们在为贵族领主劳动之余，也有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劳动和收获，如他们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好雨落在公田，私田也同时受益。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也就把谷物收藏起来，“十月纳禾稼”（《豳风·七月》）。劳动人民的谚语，也说明我国劳动人民深知劳动创造的财富来之不易，爱惜劳动的创造，视俭朴为可贵，视糜费为可耻。所以千百年来，他们常说的是：“食求果腹，衣求蔽体”，“勤以补拙，俭以养廉”，追求在劳动中发挥创造性，在生活中不要因贪图安逸丢失了进

取精神。他们提出来在生活上要做到“未雨绸缪，瞻前顾后”。可见他们储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持和发扬我国各族人民勤劳朴素的优良传统。

（二）古代的消费观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有着热爱劳动和勤俭节约的传统，并且形成了正确的消费观点。

古代劳动人民深深懂得财富产生于辛勤的劳动，只有勤劳才能使人富裕。他们认为：“慎之劳，劳则富”。（《大戴记·武王践祚·履屡铭》）但是，劳动人民长期处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们也懂得要想摆脱贫困是很难的，所以，尽管他们生活水平很低，还是不得不设法积蓄一点钱，以备生老病死之用。当然劳动人民厌恶奢华的品质也促成了他们勤俭节约的习惯。

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消费观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节约消费观。他所要求的百姓安分知足，是和劳动人民的勤劳节俭有着不同的内涵的，因而本质上是反动的。第二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消费观。他提倡为了有条件地改善生活，要为生活保留一定的后备，以防备水旱之灾，是比较有进步意义的一种观点。第三种，是墨子的观点。他提倡尚俭节用，但主张要保持适当的消费水平，超出标准将被视为奢侈浪费。这和劳动人民的消费观点是接近的。第四种，是管子的观点。一方面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宣扬节俭，但在另一方面，又主

张在某种情况下鼓励奢侈，即崇尚侈奢的主张。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孔子的消费观，是主张百姓的消费要符合他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和礼仪的规范。不论是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是劳动人民，他都提倡要实行勤俭。他怕那些封建贵族因为生活上的奢侈，导致行为的失俭，家毁人亡，所以告诫他们：“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他怕被统治者不知勤俭，对生活有过分的要求，因此提出了“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即主张生活要节约，要知足，要按照严格的尊卑上下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来安排生活。所以，他用的许多节俭的字眼，和劳动人民勤俭节约是大异其趣的。

荀子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人们要过较好的生活，不仅要求生存，而且还要有发展，这是人之常性。“食欲有鱼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而且还应有“余财蓄积之富”（《荀子·正论》），从社会生产的发展中求得生活改善。而不是追求“止欲”“寡欲”。可以说这是相当开明的主张，比较符合老百姓的愿望。

荀子提出统治者应随时注意开源节流，藏富于民，使国家有一定的储备，百姓有自己的积藏；即使遇到荒年，也不会感到困难。如果国家厚藏，百姓空乏，那就会一遇灾荒，百姓饥馑，国家危亡。因此，他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

野荒而仓廩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荀子·富国篇》）。

荀子还主张百姓消费之后，还应有一点积蓄，储藏起来，以备将来需要。他说：“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藏余”。（《荀子·富国篇》）荀子这种藏余的理论，可以看做是提倡储蓄的鼻祖了。当然，这种理论的能否实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古代思想家里，一般来说，有点平民精神的是墨子。他的消费观也是比较恰当的。他认为应该维持适当的消费水平，只要不过于靡费就可以了。百姓之用以有益于身心健康为度。如他曾说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鞅，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七患篇》）又说：“饮食：凡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同上）他还提出要多事生产，节约费用，做到“生财密而其用之节”，等等。

墨子不但有着比较恰当的消费观，而且墨家信徒都能身体力行，这一点也是其他显学所不能比拟的。

古代思想家中，只有管子别出心裁。他的消费观是提倡消费，反对节约。他在《侈靡》篇里写道：“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他要求富有者：“积者言余粮而侈，美马车而驰，多酒醴而靡。”为了扩大消费，他认为在丧葬方面多事铺张也是值得的。他说：“巨寇培，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也就是说富有者在丧事上花了钱，贫穷的人们为富有者修墓、美饰、缝葬衣，就可以得到些收入。他甚至于主张为了扩大消费，鸡蛋上雕些花

纹后再去煮食，木材上雕刻花纹再烧掉它。他主张富有者不必节约，在经济不振时，多花些钱对刺激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管子的这种消费观点在我国历史上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

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家对消费的主张，总的趋势是宣传节约，以安定民生。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内容，但是，和劳动人民朴素的勤俭风尚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和大相逖庭的阶级实质。

（三）货币储藏的开始

古代人们储藏的财富一般包括粮食、衣物、财富等等实物，但最主要的是货币。储蓄的主要内容，也是指货币的储藏。最早的应从储藏金属货币算起。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属货币出现以后，有的人卖出自己的商品，并不是为了立刻要购买商品，而是要以货币形态来代替商品形态，作为价值保存起来。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的社会内，被人们当作财富储藏起来，这是最原始的货币储藏。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有人为了买进商品而把货币积累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货币发挥储藏的机能。所以，储蓄当作保存交换商品的手段，在交换发展的初期，就开始形成了。“在商品流通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有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会转化为货币。金和银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余或富有的社会表现。在有固定的有限的需要范围适应于传统的为满足本身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方式的民族内永久化了。在亚细亚人，特别是印度人中间，情

形就是这样的。”(《资本论》第一卷)

货币的贮藏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发展,交换发达,人们有了剩余产品,才有保存自己财富的需要。一个是要有贮藏的材料和条件,也就是说要有货币。在人们开始储蓄的阶段,当然是贮藏原始形态的货币,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后,大量的普遍的储蓄就是金属货币的储蓄。

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生产落后,部落之间生产的产品交换,大部采用物物相易的形式。不存在货币的价值形态。进入奴隶社会,生产逐渐发展,劳动生产水平提高,奴隶的剩余产品增多,因而交换规模扩大,需要一般等价物来起中间媒介的作用。这就产生了用天然的、坚固耐久的具有使用价值,便于携带,有天然的单位,便于计数作价的一些实物作为商品交换媒介。我国大约在奴隶社会的殷代,就开始用贝作为交易的媒介。以后又有多种仿制的贝,如玉制贝、骨贝、石贝、陶贝等。但是殷代物质生活水准不高,即使奴隶创造了剩余价值,也不是一种商品生产,还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真正的货币。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了金属冶炼,殷末及周初,我国即有铜贝出现。青铜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金属铸币阶段。

从周代初年到春秋战国,通行的不但仍有贝币,还有多种金属铸币在各个不同的地域流行。如布币,流行于韩、赵、魏、燕、秦等国,刀币流行于齐、燕、赵等国。圉钱流行于黄河流域。南方楚国一带使用的是蚁鼻钱(为铜质,以其文字形状酷似蚁之多足与人鼻之面孔而得名),楚还使用金的“郢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六国复杂的币制，实行金、钱本位制。黄金作为上币，单位为镒，一镒等于二十两。钱是铜铸的半两钱。以后各个朝代都有些变化。但是，总的看来，我国很早就把金银作为货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具有一定形状的金银铸币，但一般只作为大额支付手段和保藏价值的工具。金、元以后，白银才逐渐发挥了货币的作用，也同样是储蓄的工具。而作为民间储蓄的主要货币还是铜钱。铜钱价值比较低，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为一般平民百姓所利用。但铜钱作为贮藏手段是有条件的，因为铸造的铜钱成色不一，当私铸的币材价值低于钱的购买力时，人们自然不愿保存低于名同价值的铜钱，这时，铜钱就不具有贮藏手段了。不过，总的看来，在铸币出现以前，人们贮藏的是金、银、生铜，在铸币出现以后，金、银、铜钱就同时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了。

在古代，贮藏货币一是采取宝藏的方式，这种贮藏多是比较成宗的钱币，放在各种各样的器具里。如庄子所说的，就有篋——箱子，囊——囊袋，匱——柜子之类。庄子还要防备“胙篋、探囊、发匱之盗。可见篋、囊、匱中必有财物，钱币当然也会是其中的一种。宝藏的第二种形式是金银窖藏，埋之于地。贮藏货币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积少成多的储蓄工具——扑满。这是我国最早的贮钱币的工具。《西京杂记》中有“邹长倩遣公孙弘书曰‘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的记载。《西京杂记》或题汉刘歆撰，或题晋葛洪撰。据考证，实系梁吴均所撰。所记都是汉武帝前后的杂事，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中国即

将扑满作为储蓄货币的工具了。

(四) 铜币的储藏

为什么除了金、银以外，铜钱成为货币储藏的主要材料呢？除了前面所谈铜钱是主要流通手段的原因以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首先，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用铜钱的多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也出现了一批农民转化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城市里依靠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这样，小手工业者，还有商人都需要用铜钱进行交易。市民百姓也需要用铜钱来换回日用品，铜钱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后，到了秦、汉，土地私有，交纳赋税，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春秋战国以前的租赋是用实物，即所谓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东汉以后，征收方式一部分用谷物，一部分用现钱，有时完全使用铜钱。如《汉书·高帝纪》：“如淳曰：汉仪注，又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田赋收铜钱了。同时，政府发给官员的薪俸，也有了改变。在汉代以前，薪俸都发实物——粟。东汉以后，即用铜钱，如《前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中说：“自为陈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

其次，是使用铜钱方便。铜钱有一定的形体、一定的成色，流通最为便利，所以元代马端临说：“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质，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圉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文献通考》卷八·货币考）他提出了由于黄金价值高昂，百姓不易得也不易通用，因此

通行铜钱。

通行铜币的原因，还由于金银本身价值高，金子虽然曾被铸成方形、圆饼、马蹄形、链状，但仍属称量货币，曾有过的金币，也是内廷赏赐用钱，并不通用。银币也是将银铸成银锭、银饼、银铤等，称为银两，也是称量货币，为有钱的官吏、商人所使用和储藏。民间的储蓄主要是铜钱。如近人张家骥也说：“考吾国货币制度，历代兴革，各有差异，大率以铜币为主，汉书食货志有三品囊铤货币之属，然度其时，已不恒用。宋元以来则有楮币，顾行之不慎，往往害国病民，为贤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铜币而已。稽其重量因时而异，约计一钱为率。至若金银虽宝贵，以未范成货币，无一定重量成分可言，故其折合铜币之率，亦随时而变动。”

（《中华货币史》）可见民间通行和储蓄的货币主要是铜钱，这不但见之于史籍，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上禁蓄钱的故事，得到反证。

人们储蓄货币是为了保值，铜币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货币制度混乱，往往发行新的铜币和旧时铜币价值不一，如果原来的旧币含铜量高，新币含铜量低，以旧币改铸新币显然有利，这时就出现了私铸的现象。而在新币含铜量高、旧币含铜量低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使用旧币而以新币熔化为铜的现象。私熔的结果是钱币减少，因此有的统治者就用行政命令禁止私蓄铜钱，这在历史上是不乏事例的。如史书所载，唐代禁蓄铜钱令始自宪宗。因唐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每千文重十斤，每文钱重一钱六分。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

每千文重二十斤，每文钱重三钱二分。而这两种钱币都是每钱当开元钱十文。开元钱每十文重一两，新发行的铜币含铜量远较旧币为低，因此，出现了私铸钱币的现象。乾元三年（七六〇年），不得不改重轮乾元钱为一当三十，宝应元年（七六三年）又改乾元钱一当二，重轮钱一当三，其后又改为大小钱一律一当一，各种大小钱都平价流通。由于每千文重轮钱可熔铜二十斤，较开元钱获利三倍以上，因此私铸转为私熔，铜币流通日少。加上政府收进铜钱，即不再投放出来，百姓知道铜钱供不应求，人们更加藏钱不用。唐王朝不得不实行限钱法。

据《旧唐书》记载，“唐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以钱少，欲设蓄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蓄钱者，并令遂便交易，不得蓄钱，天下银坑，不得私采。”（《旧唐书·宪宗纪上》）复于元和十二年正月敕：“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重轻得宜，是资敛散有节……今缙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现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又敕曰：“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流通。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限满后有违犯者，自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旧唐书·食货志上》）。可见唐宪宗为了禁蓄钱，不惜重刑苛罚，但是“方镇、大贾”，府县不得穷验，因而法竟不行。